



# 芳華永遠

封佩玲紀念文集

周宗賢 主編



# 芳華永遠

## ——封佩玲紀念文集

周宗賢 主編





# 思乡曲

岁月匆匆留不住，  
游子难忘故乡情。  
故乡情，梦里神往亦消魂。  
最难忘滚滚邕江水，  
最难忘郁郁群山青。  
满城花树开不尽，  
一年四季闻果香。  
更难忘亲友师长貌依旧，  
家乡建设换新容。  
几十年风风和雨雨，  
几十年坎坷与坦程。  
虽远在万里北国，  
也难忘生我育我的南疆，  
难忘难舍我思乡恋乡的深深情！

(原载1996年《北京老干部》第3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到[www.yrtongbook.com](http://www.yrtongbook.com)



封佩玲纪念文集 芳華永遠

舒芜 •

i



# 悼封佩玲君

广西南宁解放之初，1950年，我被任命为南宁高中校长，封佩玲是二年级学生，在全校很知名。她是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解放前已经在校内外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解放后更在全校乃至全南宁市的青年学生各项工作中积极带头。大约同年七、八月间，她就奉调离开学校，参加专职工作去了。参加什么工作，我当时也许知道，也许不太清楚，反正这在当时是一种光荣。我这个校长心里，仍然还是解放前“青年学生工作”的概念，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青年参加革命为第一要紧事，根本没有按部就班培育人才的观念。除了封佩玲这样特调的，还有一批一批参军参干运动，我都积极响应配合，完成任务。送别这些学生之后，也没有时间进行个别联系，包括封佩玲。

斗转星回，四十年过去，我们才在北京重

逢，我已经退休，佩玲和她的丈夫周宗贤先生也都是北京市的离休老干部了。彼此四十年间的情况，特别是十年浩劫中的情况，大概都是波澜起伏，沧海桑田，但是大家都没有详谈，不是“宜粗不宜细”，而是想更多作深一层的反思：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今后怎样避免？他们与我住得不远，时常来谈，乱谈一通，未必谈得出什么，但是又似乎谈出了一些东西。每年新年春节，总会接到他们的贺卡。今年春节过完，偶然检点，接到的贺卡里缺少他们的，也没有怎么在意，以为或者是忘了，或者是身体不大好，或者是不在北京吧。万万没有料到，佩玲竟于二〇〇四年二月六日因舌癌绝症去世。我教过的大学生里，已经知道有五位去世的，教过的中学生里，知道去世的，佩玲还是第一位。古语云“寿则多辱”，看来还得加上，多活几岁则难免多有“白头人送黑头人”的机会，尽管我教书早，学生往往比我小不到几岁，佩玲就不是黑头人了，现成语句姑且就这么借用吧。

佩玲的妹妹佩琳，当年也是我的学生，她和佩玲的儿子周林同来，给我看一本《芳华永远——封佩玲纪念文集》的打印稿，要我也写点什么。我通读之后，才明白佩玲的一生大概。原来她当年从南宁高中调出去，经过短期锻炼培训，就以一个十多岁的女青年，调团市委机关工作，不久提升为南宁团市委宣传部长、副书记。此后服从工作需要，调动频繁，始终做团的工作。“文革”开始，她在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当团委书记，成了该校第一个被游街批斗的“走资派”。此后，各种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惊涛骇浪接二连三打来，抄家、殴打、下放、苦役……吃的苦头比我这个“摘帽老右派”多得多。“文革”之后，终于和丈夫一起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离休干部的身份，享受了平静的晚年。



2001年同著名作家舒芜合影（右起第二人为封佩玲）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从解放前夜投身革命起，就是绝对纯洁、绝对虔诚、为理想而奋斗的。这样说来，似乎抽象一般，但是我本来很熟悉那一代青年，而近些年来的一种论调，却把他们描写成一群愚昧盲目的暴徒，或者是随波逐流、热中躁进之辈，和我的记忆差得很远。究竟是怎样的呢？不能光凭笼统的记忆说话，现在有封佩玲的生动的“个案”摆在面前，再一次支持我否认那种论调，从而可以把问题推向更深远处。

《芳华永远——封佩玲纪念文集》里面有佩玲的一篇《文革逸事》，是周宗贤先生根据遗稿整理完成的，他在附记中陈述佩玲的看法：“她认为，作为我们经历过这段痛苦经历过来人，有

责任将真相告诉后代，把当时被扭曲了的人性所演出十年之久的荒唐、愚昧、疯狂的历史展示给后人，以引起后人的警觉，永不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总结‘文革’，要超越个人苦难和恩怨来说历史，也不要过于追求某个人的责任，要总结出造成‘文革’的社会、历史、政治根源，吸取教训，这才是留给后人的珍贵财富。”关于这后一方面，周宗贤先生说：“我就无能为力了，应该说，这也是一個很大的遗憾和损失。”

是的，我和他们两位多次纵谈，都是围绕着“总结文革”这个大题目，当然没有得出什么清楚的结论。问题本来不简单。如果他们当初就是一群愚昧盲目的暴徒，或者是随波逐流、热中躁进之辈，那么他们就在造成全民族大苦难的罪人之列，自己也逃不出苦难只是活该。可是，他们当初是那样绝对纯洁、绝对虔诚、为理想而奋斗的，他们自己忘不了，我也亲见亲知，忘记了。那么，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当初信奉的理想，是伟大的科学的么？那么后来是谁歪曲、篡改、背叛了理想，出卖了纯洁虔诚的信徒？那个理想本来就包含错误么？错在哪里？根本就是幻想、妄想、歪理、诡辩、欺骗么？他们为什么受骗上当的？而且那一代两代的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精英，怎么都会受骗上当的？……我们经常就是在这些问题里面绕来绕去，很难得出清楚的结论。我倒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遗憾，我常说，整个二十世纪留下的这么些大问题，恐怕也得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时间来反思解决。佩玲多次听我说过，现在还是用这句话作为我“白头人送黑头人”的奠礼。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舒芜在北京。



# 我们的母亲 是很纯的人

——一个陌生人对封佩玲的思与想

今年四月五日晚上，我刚从海军总医院采访出来，因为过于疲倦，我在车里靠着座椅睡着了，这时，接到周林的电话，说他就住在附近，有事想和我说。见了面才知道，是他母亲于不久前去世，想让我写一篇文章。我知道我没有理由不答应。后来约了几次，于五月下旬，由周林陪同，见到了他的父亲周宗贤先生，还有一位他的母亲的生前挚友、来自南宁的吴洁萍女士。那天，我再次答应写篇关于周林母亲的文章。我对周林父子和吴老师说，我愿意写一篇文章，而且相信自己一定能写好。也许就是这句话，让我不敢轻易下笔，客观地说，这也是这篇文章一再拖延的一个原因。

那天我就拿回了厚厚一摞材料，包括封佩玲的亲友们的回忆纪念文章，还有封佩玲本人的作品。连续很多个晚

芳草永逝 封佩玲纪念文集

## 我们的母亲是很纯的人

vi

上，我都沉浸在封佩玲的人生之中。感慨是那样多，一时不知从何下笔。那段时间，我同时又答应了另一个朋友的约请，就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写一篇文章。阅读那本书，给我的感慨同样的多，我也就同样的不知从何落笔。我的确又不是一个很勤勉的人，那一段也不知怎么的，又好像有许多事情，心境总是安定不下，在慌乱与愧疚中，几个月就过去了，两篇文章到底都没有写出来。一周前，周林又打来电话，耐心地说，名为《芳华永远》的纪念文集已经编好，还是想让我写一篇东西。他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任也穿透了我的内心，彻底征服了我，我不得不整理思绪，写下这篇文字。

对于周林的母亲，我应该称伯母的。但为了使叙述有一个冷静、客观的历史角度，请允许并原谅我在下面的叙述中对所叙人物直呼其名。

五月下旬那天晚上，到周家时已是晚上十点了。因为时间关系，又是与两位长辈初次见面，谈话其实也很简单。但我仍然被打动了。那是对逝者真挚的怀念，和失掉亲人的肺腑之痛。吴洁萍女士谈了一些她与封佩玲的交往，主要是封佩玲对她的帮助，事情都很具体。还有他们谈到封佩玲刚去世时，亲友和邻居对她的怀念和追思。那种悲痛，他们说得很动情，所叙十分具体，所有这些，都使得那悲痛也变得十分具体，我听了也不能自己。几周之后，我又单独访问过一次周宗贤先生。我对封佩玲的所谓直接了解，就是这些她的亲人和朋友的叙述了，再有就是阅读了大家写的文字，与封佩玲本人的作品。与这本集子中那些和封佩玲有过几十年交往和友谊的前辈和其他作者相比，我对传主的“了解”和感情实在太过单薄和肤浅，而他们都与她有很深的友谊和

亲情。我是这本纪念集的作者中，唯一没有和封佩玲见过面的人。我是在她成为古人之后，才知道她的名字的。由这样一个人来写这样一篇怀念文章，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这意义就在于我与她并无直接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可以没有这些关系所带来的对观察和叙述的先在的限制，可以在阅读了大家对封佩玲的不同回忆和描述之后再来发表自己的一点看法，也许也就可以从一个更客观的历史角度来讨论封佩玲女士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意义。

无论从中国传统的旧道德，还是从“革命”的“新道德”来看，封佩玲都是一个“好人”。她的婆婆也就是周林的奶奶的最后将近二十年的时光，是在封佩玲的照顾下安度的，老婆婆得以安享九十八岁高龄。只这一点，就没有人能从旧道德的角度否认一名儿媳的劳苦功高和嘉品懿德。至于她在多年来在生活中对亲人、朋友，对同事与同志的种种善行与厚德，各位作者在本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描绘和记述。她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一个好姐姐，是弟妹们“人生路上的导师”，和兄长则是“同志加兄妹”。对孙辈而言，她也是一个好奶奶。在单位，她对同志、对同事的帮助，也令许多人难以忘怀。总之，从中国人传统的私德来看，她近乎于无可挑剔。而所谓“革命”的“新道德”，就是你对“革命”的贡献了，就这一方面而言，本书前面恰有一个现成的概括：

封佩玲，女，汉族，广西南宁市人，1932年9月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949年南宁解放前夕，她在南宁高中读书时，秘密参加了地下青年团组织，积极进行革命活动，迎来了南宁解放，旋被组织选调参加“土改”工作队，兼作团的工作。

## 我们的母亲是很纯的人

1952年调南宁团市委，先后任宣传部干事、副部长、部长和团市委副书记。1957年下放广西建筑安装公司劳动，不久调广西建工局任人事科副科长兼局团委书记。1962年，调回南宁团市委任副书记、市青联主席。1965年，奉调中央对外经委，安排在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任团委书记兼印尼语系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恢复工作后，先后在北京市第112中学、西城区区委党校、房屋政策落实办公室、财贸干校、区委财贸部等单位工作，1985年离休。离休后，做了大量有益的社会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病逝，终年72岁。

这就是封佩玲将会留存于历史的一个“简历”。这是一种在中国适用了多半个世纪、至今仍旧普遍适用的所谓个人“简历”。我们在这个国度生活的人，谁都习惯了这样的描述。准确地说，这个“简历”是她的工作简历，其实只是她作为一个人的一生的一部分。她何时结婚的？何时成为母亲？何时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一生当中，内心都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变化？她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些，在后人概括她的一生时，与上面这些工作经历相比，似乎都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以至于无——当然，实际上，全书的记叙已经把这些她作为一个人的那些方面讲得十分充分。但是，如果用最简短的文字来概括她的一生，人们包括她最亲爱的人，还是不由自主地用某种范畴来概括和总结。这也不奇怪。半个多世纪以来，做螺丝钉，做马前卒，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些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成为一个价值尺度。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包括她最亲爱的人对她的总的概括还被框定在一个无形的大框框里；另一方面，也



1961年封佩玲、周宗贤同大儿子周林及小妹佩珊在南宁公园

恰恰说明，封佩玲本人一生的总的人生角色就是一个为党和革命或者说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的好党员。

由此，我就十分理解，周林三番五次与我讲的“我妈妈是一个很纯的人”的某种意思。

听说，因为周林写下了《一个未了的心愿》，而引起了一些争议。那篇文章记述了周林的母亲封佩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所表达的一个愿望。

“春节过后，我的在南宁担任市委副书记的二舅到医院向妈妈告别。妈妈用笔在每天同她笔谈的小本子上写道：“家骥：听说南宁市曾经做出决定，凡（19）56年前定为副县（团）级的一

## 我们的母亲是很纯的人

x ➔

律定为正处级。是否有其事，哪一年定的，你查查看？”二舅走后第二天，妈妈还向爸爸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让爸爸打听一下北京的一位王姓干部的正处级待遇是如何解决的。

“妈妈提问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由于病重原因，妈妈本人在当时已经无法清晰地说明。当我获知妈妈的这个提问时，立即想到，这个提问，可能包含着深刻内涵。从表面上看，妈妈是想透过她的两个最亲近的人，了解南宁市政府一份文件的内容，间接地表达出她的一个心愿：应当按照有关文件精神，重新确定她的正处级待遇。因为按照南宁市这份文件的精神，妈妈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享受正处级待遇；和妈妈情况大致相同，符合这份文件条件的北京的那位王姓干部的正处级待遇已经解决。”（周林、周平《一个未了的心愿》）

以封佩玲的革命资历，工作履历，或者说得冠冕堂皇一些，论她的革命贡献，她的这个愿望甚至就算是要求，都是毫不过分的。但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过分的想法，她要表达出来，都要顾虑很多，乃至她的儿子代她表达，也同样会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以致于要为他们的母亲做很多解释（见周林、周平《一个未了的心愿》）。周林和他的妈妈都不是虚伪的人，妈妈写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儿子把它忠实地表达出来。由此，我相信周林所说的，他妈妈是一个很纯的人，也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但是这纯，应该更有另一层的含义。在“四清”运动中，封佩玲逼着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周林的外祖父交待“历史问题”，也就是1949年以前的生活经历。不但要交待本人的，还要交待封佩玲的爷爷的。

“父亲把自己做小商小贩的主要经历进行了回忆，大姐似乎

‘挖’不出什么东西，对父亲很不满意。此后，大姐又多次向父亲‘动员’，并把‘老老实实坦白交代’挂在嘴边，并说‘交代’了如何如何对大姐‘带队搞四清’重要。

“‘你要老老实实把自己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干些什么，详详细细写出来，这是向党表示忠诚，是与旧社会划清界限！也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大姐见问不出什么东西，十分光火。”（封家骥、封家麟《大姐，我们事业发展的路标》）

从“动员”到“审问”，女儿因为有着一个更高的信仰，因为另有政治上的追求，所以对父亲铁面无私。她“为向党表白忠诚，真是不惜大义灭亲”，她把“带队搞四清”看得比父亲的尊严和内心感受要重要得多。她把父亲写的材料上交了“组织”。正如经历过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的人都知道的，封家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因为封佩玲对党的忠诚，在“文革”中他们被认为是不洁分子，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但即使在这时，封佩玲仍然对父兄说“要相信共产党，要相信组织，不要抵触，总有一天会还我们清白”。我相信，这确是她的真心话。

封佩玲的确是一个很纯的人，像我的父亲和母亲一样，像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国家，党，组织，人民，集体，等等，绝对地与伟大、崇高、光明等等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正面价值。所以，周林说他的妈妈很有典型性，我完全同意。就是这样纯的人，他们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了他们的组织，为了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和人民，一直奋斗不息。完全不能想象，没有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我们可以拥有现在的一切。这样一批老前辈，在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虽然生活兴趣和生活方式各异，但他们都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其中一个就是反思